

CONTESTS  
FOR  
CORPORATE CONTROL

Mary A. O'Sullivan

公司治理百年

——美国 and 德国公司治理演变

[美] 玛丽·奥沙利文 著 黄一义 谭晓青 冀书鹏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 公司治理百年

——美国和德国公司治理演变

[美]玛丽·奥沙利文 著

黄一义 谭晓青 冀书鹏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司治理百年——美国和德国公司治理演变/(美)奥沙利文(O'Sullivan, M. A.)著;黄一义,谭晓青,冀书鹏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1

ISBN 978-7-115-14401-0

I.公… II.①奥… ②黄… ③谭… ④冀… III.①公司-企业管理-经济史-美国 ②公司-企业管理-经济史-德国 IV.F279.712.46 F279.516.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6183号

Mary A. O'Sullivan

**Contests for Corporate Control**

ISBN 0-19-829346-1

Copyright © Mary O'Sullivan 2000

**Contests of Corporate Control**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本书英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中文简体字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4-322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mail: marketing@ncc-pub.com

## 公司治理百年——美国和德国公司治理演变

- ◆ 著 [美] 玛丽·奥沙利文  
译 黄一义 谭晓青 冀书鹏  
策 划 刘 力 陆 瑜  
责任编辑 高 雁 谢春英  
装帧设计 O. E. T.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A座  
邮编 100061 电子函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电话 (编辑部)010-64964059 (销售部)010-64982639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 开本: 670×970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42千字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4-3227  
ISBN 978-7-115-14401-0/F·781

定价: 6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电话:(010)64981059

## 内容简介

---

本书是关于美国和德国公司治理百年演变的历史著作。玛丽·奥沙利文通过综合运用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及德国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可谓开公司治理史研究之先河。全书以创新、资源配置与治理开篇，首先对作为公司经济起源地并引领世界公司变革潮流的美国公司治理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接着又对德国公司治理的变迁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本书贯穿了美德两国公司治理的实例，详细阐释了两国的管理控制的奠基、演变和面临的挑战。对于想要了解美国和德国的公司治理是如何演变为今天的模式及其对整个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为现代的公司治理提供良好借鉴的读者，本书无疑是不二之选。

## 译者序

本书是近年国际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主要收获，无论在经验资料还是理论分析上均超越了此前的主要著作，如玛格丽特·布莱尔的《所有权与控制》、孟克斯等人撰写的公司治理专著，更不用说有关公司治理、董事会运作的种种应时之作了。作为另一流派的代表，迈克尔·詹森的两本书在理论深度和经验分析方面或许与本书处于同一水平。

本书首先是一本关于美国和德国公司治理演变的历史著作。它从20世纪初美国现代公众公司的兴起讲起，一直写到20世纪末，对作为公司经济的起源地并引领世界公司变革潮流的美国公司治理体制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为了进一步说明公司治理体制演变的模式，作者又对德国公司治理的变迁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美国及德国公司治理的力量和问题才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和比较的角度——就像大多数公司治理方面的论著那样——就无法对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体制给出像样的解释。因此，本书不仅开公司治理史研究之先河，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是从经济分析和比较的角度撰写的，由此可以对许多难解的问题给出新的洞察；这正是本书的重大价值所在。如果读者想知道美国和德国公司治理是如何及因何会演变为今天的模式及其对整体经济绩效的影响，本书无疑是首选，而且是不二之选。

其次，本书不仅具有扎实、丰富的历史和比较经验资料，而且在理论上独树一帜，且具有很高的造诣。传统的公司治理智慧以股东价值论为圭臬，例如詹森等人提出的代理理论。此后又有利益相关者说的发轫，如布莱尔等人的著作。这些理论均把企业或公司理解为一种契约的集合，进而还原为作为要素拥有者的个人集合，从而忽略了企业的组织过程。实际上，现代创新是一个集体的累积过程，而不是牛仔式的匹马打天下。而创新可以说是现代经济持续成长的惟一动力，其重要性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因此，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体制才能支持创新，就是说，

导致创新持续涌流的组织学习是如何发生的。本书在理论上彻底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巢臼，直接以熊彼特等人的理论和关于创新的现代经验研究为依据，概括了现代创新过程的基本特征，进而指出了支持创新的企业资源配置过程的特征，然后提出了支持创新及其资源配置过程的公司治理特征。以这样的理论分析为指导，并配合以详尽的历史和比较研究的经验资料，本书完成了对股东价值论及其理论变种利益相关者说的颠覆，而且是具有强劲经验支持的颠覆。难怪股东价值的倡导者及著名活动家孟克斯也称本书是“这一论题的最佳单本著作”。

在中国，公司治理似乎已成为企业改革，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主要进路。不幸的是，中国的公司治理在理论上主要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依据，在实践上则深受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美国的股东价值运动的影响。例如，某权威人士提出中国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这种观点显然是以产权理论和股东价值论为基础的。殊不知，现代公众公司从一开始就是以“所有者缺位”为基本特征的，股东的所有权被淡化。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内部人控制”或管理控制；而与组织学习融为一体的“内部人”及其控制，恰恰是现代产业创新得以发生和持续开展的必要条件。当然，关于这种主流思路的反对意见也时有所闻，例如最近郎咸平提出的一些观点。尽管郎氏强调以“数据”说话，但其案例研究却漏洞百出，而且只有一些简单的财务分析，缺乏历史、战略和经济绩效分析的角度和厚度。

在这种令人迷茫的环境下，玛丽·奥沙利文的著作不啻为一股清风。它不仅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和思路，而且提供了一个模板，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研究和分析才是上乘之作。如果这种研究风范能够化入我们的研究，我国的公司治理争论的档次将大大提升。如此，则中国企业幸甚，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无疑也会受益良多。

本书由我组织翻译，具体分工如下：黄一义（致谢 导论、第1、2、3、6、7章、结论及第8章的一部分），谭晓青（第4、5章），冀书鹏（第8章），此外，颜晓东、许婕和任柳也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翻译工作。全书由我最终改定。

黄一义

2006年10月

## 致 谢

我对公司控制这一论题的兴趣可以追溯至十多年前。我生长在爱尔兰，这是一个在就业、出口和增长方面均严重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因此我对大公司给地区和国家经济以及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深感困惑。企业组织与爱尔兰的经济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让我十分感兴趣，而且这也确实成为我作为一名学者的研究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使本书成形的研究学习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到了理解发达经济国家的公司控制演变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的都柏林失业率高达两位数，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景象——塞尔特之虎（Celtic Tiger）的崛起和欧洲的万象之城（Europe's party capital）——殊少共同之处。像在我之前的众多同胞一样，我的头一份工作也是在国外获得的。1988年我来到伦敦的麦肯锡公司（McKinsey and Company），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正是在这里，我对金融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麦肯锡资助我到哈佛商学院攻读MBA时，我就得以在一种更具学术氛围的环境下发展我的兴趣了。

我于1990年来到哈佛商学院，当时以交易时代（Deal Decade）闻名于世的金融重组浪潮已经停息，但它给美国公司经济带来的影响这一严重问题被提上了讨论的议程。国际社会正在大肆宣扬日本的公司治理体制。这正是赴哈佛商学院求学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那里正在对公司治理体制进行热烈的辩论；主要针对不同的公司治理体制对增长、就业和至少某些阶层的平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

在我攻读MBA期间，有三位教授对我的研究进程，特别是在鼓励我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决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位是Richard Viotor，他鼓励课堂讨论，并且拒绝任何模棱两可的废话——无论言辞如何华丽，这使他的授课成为我参加过的最具启发性的课程。William Sahlman是一位创业融资专家，他的分析课程是全校最具挑战性的，他经常提醒我们，关于金融分析的技术及应用我们还有多少未知的东西以及这些技术和应用的

## 4 致谢

局限性。最后，在向我证明念博士的重要价值方面发挥了最大作用的则是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

詹森在哈佛商学院的讲座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他的课程基本上就是不断地论述股东价值作为公司治理原则的优越性。作为一名教师和作家，他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使很多学生相信杠杆收购和敌意接管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我十分欣赏詹森的课程，尽管我对他的某些核心观点感到不解。正如本书的论证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困惑已滋长为一种对股东价值倡导者的直接反驳。但从彼时走到此时是一段很长的路程，而迈克尔·詹森鼓励我提出问题，建议我进一步研究经济学以加深对公司控制和经济发展的理解，并推荐我去哈佛经济系学习企业经济学的博士课程，他的这些帮助使我走上了现在的道路。

从一间学院转到另一间，尽管它们同属于一所大学，仍然是一场系统性的冲击。从早期的“数学化运动”以来，经济学家显然最注重的是分析而不是辩论，是一般的原理而不是一堆例证。对于一个念了两年 MBA 课程，读了许多已经记不住的案例和听了许多信念胜过实质内容的课堂讨论的学子来说，这一冲击在开始时是相当新鲜的。最后，我终于有机会形成自己的分析能力，能够以一种严格、科学的方式对经济制度运行和演变的内在原理进行了分析。

由于课程过于紧密，我们没有时间对学过的东西的价值加以反思，这种严格的、科学的分析的光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得以慢慢消散。一件偶然的事情一直让我不能忘怀，它播下了我怀疑的种子，使我对所学的东西的实际意义产生了疑问。在 3 个月紧密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后，教授在演示了 15 行方程式之后停下来问我们其基本的含义是什么。课堂的反应是一片沉寂。他再次提问，这次还给我们做了提示：“当价格上升时……”，然后等待我们完成他的陈述。但仍然无人回应。显然，我们的学业太过高深了，以致我们甚至不能把握初级经济学课程都讲到的价格与数量的反向关系！

直到最后几个星期 Steve Marglin 教授开始讲授微观经济学课程时，我才发现先前课程的系统偏见究竟何在。Marglin 给我们讲了 4 个星期的课，内容全都是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观点。这样我们才头一次（对许多学生是最后一次）得以了解熊彼特、马克思和凯恩斯以及其他各位大胆抛弃主流经济学路线的经济思想的学者。

记得在完成了公共课考试后，我在夏天离开了哈佛，当时仍处在极大



的困惑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疯狂地阅读，试图从经济思想的演变来理解这些课程内容的适用性。这一挑战至今对我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但即使这样，在当时我也很快发现，在哈佛经济系被当作科学研究的精华进行学习的经济学只是经济思想家诸多学派的冰山一角。我集中研读了有关公司经济的经济学，并且发现，虽然哈佛产生过一批最有原创性的经济思想家，但他们的遗产已经被系统地抹去了。

在我回到哈佛后，我开始与 Steve 一道工作，他是我的论文顾问，并成为我在博士研究期间最重要的导师。他的指导，特别是他对储蓄和投资的兴趣，使我认识到公司资源配置对经济产出的重要性。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我获得了足够的信心来挑战公司治理争论中主流观点的经济基础。

在我工作的不同阶段，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其他教员也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其中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对我的帮助尤为突出。该系的一些学生，特别是 Sanjay Reddy 和 Jeff Bernstein 也使我的研究进程和作为研究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作为一名企业经济学的博士生，我得到允许可以请一些非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加入我的评审委员会，利用这一机会我受到了另外两位学术顾问——哈佛商学院的乔·鲍尔（Joe Bower）和法学院的罗伯托·昂格尔（Roberto Unger）的眷顾。我在念 MBA 时就认识乔，并且经常就我的工作与他进行讨论。他以前曾对公司的资源配置进行过研究，这意味着他是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的一个很棒的学术伙伴，因此自然成为我的导师人选。在哈佛法学院昂格尔与另一位法学教授 David Charny 合开了“企业、工人和政府”这门课程，我是通过该课程了解到昂格尔的工作的。由于我来自经济系，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想正处于上升势头，而且我的许多过去的同学毕业后跑到了莫斯科，自以为他们正在为俄罗斯的人民大众带去市场经济的福音，此时，我更加感到昂格尔的思路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了。我已经决定成为一名批判经济学家，但昂格尔的观点和原创性的论证会经常提醒我经济决定论的危险，这正是许多经济学思想流派共同特征。无论在哈佛商学院还是哈佛法学院，都有来自同学的友好情谊，作为同学和朋友，Jonathan West 和 Kerry Rittich 尤其值得一提。

确实，在哈佛念博士的最大好处正在于它使我有机会开展多学科的研究。这无疑是一种挑战，往往还是一桩令人头疼的事情，有时我也会对它将我引向何方产生疑问，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下面的问题：如果出于理

解我所研究的问题的需要，学科界限是必须跨越的。我在哈佛欧洲研究中心度过的时光使我受到了鼓舞。我十分感谢 Charlie Maier 和 Abby Collins 的帮助以及在那里接触到的其他学者，在那里我曾经是一名研究生，后来成为见习教员。哈佛商学院的企业史研讨会经常会提醒我们公司经济的复杂性，但也指出了跨学科讨论的可能性。在那里我很高兴能够结识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托马斯·麦格劳（Thomas McCraw）和 Takashi Hikino 等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以及来此发表演讲的其他著名学者。

正是通过企业史研讨会，我认识了经济学家比尔·拉让尼克（Bill Lazonick），他曾经是 Marglin 在哈佛经济系的同事，此后他先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然后转到美麻州大学罗威尔分校，帮助该校建立研究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我当时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兰开夏棉纺织工业史的学期论文，被建议去找比尔，他一直长期参加企业史研讨会，而且是纺织工业史的著名专家。

比尔也是一位著名的批判经济学家，而且作为一个经济学出身的学者（拉让尼克于 1970 年代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译者注），他毫不在乎那些迷恋所谓“市场经济神话”的学者这样称呼他。我们的首次接触并不愉快，却演变为关于企业组织和比较经济史研究的长期合作，而且现在仍在继续。我与比尔的合作以及我们之间的讨论对本书观点的形成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

通过比尔，我还结交了一些定期参加麻州大学罗威尔分校周五研讨会的学者，包括 Beth Almeida、Mike Best、Bob Farrant、Erin Flynn、Ann Frost、卢启文、William Mass、Phil Moss、Chris Tilly 以及该校的副校长 Fred Sperounis 和校长 William Hogan。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参加这一研讨班的学生人数证明了这种讨论的质量，也说明类似讨论在剑桥地区（即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所在的地区——译者注）的缺乏。我在这些讨论会上遇到的许多人士如今仍然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发挥着作用。

只有在作致谢时，人们才会发现有多少人对其写书过程中的思想形成产生了影响。Keith Smith 在我研究公司治理的早期阶段在人力和财力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特别是，他通过 STEP（技术、创新和经济政策研究）集团为我在奥斯陆一个夏天的论文研究工作提供了资助。在此期间，我获益良多，尤其是从与 STEP 其他研究人员的互动中。在另一种学术环境中，以下人士，包括 Franco Amatori、Alice Amsden、Ron Blackwell、Kristine

Bruland、Youssef Cassis、崔之元、Andrea Colli、Ronald Dore、Lou Ferleger、Martin Fransman、Patrick Fridenson、Lou Galambos、Les Hannah、Philippe Haspeslagh、Gary Herrigel、Ulrich Jürgens、Henry Mintzberg、Jonathan Story、Kazuo Wada、Christian Weller 和 Jonathan Zeitlin 给予我的评论均值得特别提及。

哈佛商学院、哈佛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和哈佛欧洲研究中心的教职员给了我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几年以来，我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得到 Levy 研究所的持续资助——我在其中担任研究员。欧盟委员会也通过以下项目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财务支持——先是通过瑞典 Linköping 大学 Charles Edquist 指导的 TSER，代号 SOE1-CT95-1004 的“创新体系和欧洲一体化”项目，然后通过比尔·拉让尼克和我在欧洲管理学院（INSEAD，European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联合主持的 TSER，代号 SOE1-CT98-1114 项目。

3年前我被任命为欧洲管理学院（INSEAD）的助理教授。起初，由于大多数商学院均不大考虑其对公司控制问题开展批判性讨论的责任，我对接受这一教席予以保留。在这方面，INSEAD 也不例外，虽然那里也有一些人认识到了教育学生批判性地思考其职业生涯赋予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角色的重要性。但 INSEAD 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致力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学校。考虑到学生的国际多样性，即使有人想这样做（确实有许多人在这样做），也很难阻止人们对不同公司治理体制的讨论。对那些看重高水平的学术讨论的人来说——也许由于我是一个好争辩的爱尔兰女性，也因为我看到许多经济学院对开展此种讨论不感兴趣的后果——各种背景的学生均经常乐在其中。当我感到丧失了进一步前进的动力时，是我的 MBA 学生推动我继续提炼关于公司治理的想法，我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们向我证明，关于经济效率和平等的严肃讨论也可以发生在商学院。

我还想特别感谢 Valérie Bouland 和 Michèle Plu，自从我来到 INSEAD 以后，他们对本书写作提供的帮助是难以尽数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 David Musson 对我写作本书的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他的耐心和毅力的完美结合得到了体现。T. W. Bartel 在手稿的编录方面做得十分出色，而 Sarah Dobson 对本书的出版过程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我的家庭对这本书带来的烦扰已忍受了很久，但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本书肯定是无法完成的。当我过于看重本书的手稿和我本人的得失时，

## 8 致 谢

他们总会令我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困境感到可笑。应当给予我父母特别的感谢，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本书写作期间给予我的帮助，而且在于比这长久得多的时间内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他们年届 60 之际我将此书献给他们。有时他们认为在他们 70 岁时本书才会出现在书架上，我很高兴能证明他们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然而，作为一个凄凉的声明，我要向我的伟大朋友卢启文表示哀悼，为我们过去 6 年进行的许多有益讨论，以及一起度过的许多愉快的时光而哀悼。启文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但我们相识在麻州大学罗威尔分校。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走同样的路：同时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同一个地方获得了头一份工作。我们还同时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约出书：我的是这本公司治理著作，他的则是一本关于中国本土高科技公司的著作，即将出版（此书名为 *China's Leap into the Information Age: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Computer Industry*，已出版——译者注）。1999 年 8 月，当我们的著作均已杀青之时，启文在手术台上去世，留下了他的夫人莉莉和两个女儿 Mindy 和 Jessie，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包括爱他和尊敬他的我。启文的死与生提醒我，生活赐予我的是如此之多，已远远超出我应得之物。

# 目 录

导 论	1
<b>第1章 创新、资源配置与治理</b>	<b>11</b>
引 言	11
创新的特征	12
累积性	12
集体性	14
不确定性	18
创新型资源配置	20
开发性	21
组织性	21
战略性	23
创新型资源配置与新古典式的资源配置	23
累积性与新古典理论	28
资源配置的另一种概念	31
资源配置与公司治理	39
总 结	41
<b>第2章 公司治理讨论的转变</b>	<b>43</b>
引 言	43
公司治理的股东理论	45
利益相关者的观点	54
组织控制理论	60
组织控制的逻辑	61
组织控制与创新	63
组织控制的制度基础	68

## 10 目 录

总 结	69
<b>第3章 管理控制在美国的奠基</b>	<b>72</b>
引 言	72
管理控制的历史基础	73
公司管理者的组织整合	74
股份所有权的分散	77
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	80
公司法的兴革	82
管理控制与大萧条	85
公司自由主义的局限性：通用电气和作为受托人的管理者	87
大萧条的降临	92
新政老路	94
现代美国公司的治理	95
工人的新政	99
保卫公司管理者的管理“权力”	103
<b>第4章 战后美国管理控制的演变</b>	<b>109</b>
引 言	109
战后大批量生产企业的治理	111
管理控制的内部限制	112
走向战略分割的趋势：多角化集团	113
大型多角化集团对业绩的影响	119
战略分割趋势：核心公司制企业	121
广义的电子业与创新治理	128
联邦政府的作用	128
风险资本的作用	136
创新型公司持续投入的重要性	141
总 结	150
<b>第5章 二战以后美国管理控制面临的挑战</b>	<b>152</b>

引 言	152
生产领域的挑战：新竞争的出现	153
日益增长的金融变现压力	160
家庭储蓄的演变	161
应对日益增长的代际依赖	163
股票市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	168
交易 10 年	170
机构投资者干预主义的兴起	183
总 结	193
<b>第 6 章 美国公司对新挑战的回应</b>	<b>195</b>
引 言	195
美国大公司的回应	197
公司裁员的趋势	197
股利支出和股票回购支出的增加	201
对“裁员加分红”政策意义的评价	203
简洁、有效、公司机器	204
立场决定观点	206
我们编织了一个多么复杂的网……	213
公司股票的供求	215
创新与“新”经济的繁荣	220
总 结	242
<b>第 7 章 德国：从管理控制到对峙型控制</b>	<b>245</b>
引 言	245
战前管理控制的基础	246
管理者的组织整合	247
财务投入的制度支持	248
管理控制日益增长的专制倾向	251
战后的公司治理体制	254
财务承诺的继续	254
管理控制的争夺：共同决定制	258

## 12 目 录

战后德国的组织整合	260
公司治理与绩效	263
总 结	271
<b>第8章 德国组织控制面临的新挑战</b>	<b>273</b>
引 言	273
组织控制所面临的金融挑战	274
德国的养老金供应体系	276
提前退休的压力	278
对组织控制的生产挑战	280
对治理挑战的回应	284
回应生产性挑战	285
对金融挑战的回应	293
德国公司治理向何处去	302
<b>结 论</b>	<b>304</b>
<b>参考文献</b>	<b>313</b>
<b>索 引</b>	<b>336</b>



# 导 论

最近 20 年来，美英两国对于应当怎样进行公司治理以增进公司和整个经济的绩效进行着广泛的讨论。但直到不久前，欧洲大陆国家、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都比较少。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这一问题已成为所有经济发达国家一个重大且众说纷纭的话题，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亦日益受到重视。诸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也把公司治理看做一个全球性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一定程度上，当代关于公司治理的争论有缘由，它来自经济学家对某一经济体中公司制企业对资源配置所起的核心作用的体认。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公司制企业通过投资、雇佣和贸易决策对经济产出产生关键性的作用。就是说，该经济体的绩效与公司的资源配置过程息息相关。保留的盈余——未分配利润和资本支出的免税额，过去一直而且仍将为企业提供财务资源，即生产能力投资的基础。公司如何配置其巨额收益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而公司决策者的这种战略选择会对经济的整体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济分析的研究重心在于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为了说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力图发现以下问题的答案：“这些资源配置决策将如何制定？谁来制定这些决策？怎样才能引导决策制定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在进行决策之前，他们应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应获取多少，以及怎样获取这些信息？怎样才能控制数百万彼此分离的经济主体或决策者（Stiglitz, 1994: 13）？”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讨论的是那些影响企业法人资源和收入分配的制度。具体说来，公司治理体制决定着公司中谁有权做出投资决策、做出何种类型的投资决策以及如何分配这种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对公司治理的兴趣也在于它对企业和社会层面的绩效所做的贡献。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正是公司治理体制与公司制企业自身的经济绩效以及它们赖以存身的整个经济体之间的